

目 录

黄埔建军	覃异之 [1]
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	李奇中 [20]
中山舰事件前后	包惠僧 [40]
记舒宗鎏等谈中山舰事件	覃异之 [54]
滇桂战争	黄绍竑 [57]
刘镇华的一生	米哲沅 [78]
徐树铮之死	吴锡祺 [107]
一九三五年参谋团入川前后	吴晋航 [111]
一九三六年成都事件	何北衡 [122]
虹桥事件的经过	董昆吾 [131]
关于再造派	周一志 [134]
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	叶景莘 [144]
辛亥福建光复回忆	刘 通 [154]

附 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名单	[170]
-------------------	---------

附注

对《黄埔建军》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七辑一六八页

对《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一九页、第三十辑二四一页

黃埔建軍

覃異之

一、黃埔軍校的建立

黃埔軍校是按照苏联紅軍的建軍原則和作战經驗來訓練幹部的新型軍事學校。它是國共合作的產物，也是苏联援助中國革命的第一个重要標志。

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一年經李大釗同志的介紹，在廣西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會談的時候，馬林即曾向他提出了關於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軍隊的建議。同時，中國共產黨也曾通過黨刊《向導周報》，對孫中山幻想利用軍閥力量、企圖從軍事投機中取得勝利的錯誤提出了善意的批評，指出只有仿效苏联，建立革命軍隊，革命才能獲得成功。例如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向導周報》第九期載有“國民運動、革命和革命宣傳”一文，其中批評孫中山先生“只是時常依靠別的有力分子對他的感情為轉移，那些有力分子昨天還是他的好朋友，今天能夠反臉，明天或成仇敵”，並且指出“堅強的紅軍能夠組織成功，便因為有真正革命精神。……所以紅軍是一個真正革命的軍隊，無論何時，都能為保護社會革命的紅旗而死。”

由於共產國際的建議和中國共產黨的督促，同時也由於革命形勢的迫切需要，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後，即積

極着手筹备建立陆军军官学校，並决定利用黄埔島上原有的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的校舍作为军校校舍。因为军校設在黄埔，所以以后一般通称为“黄埔军校”。

当时在广东的粵、滇、桂等系軍閥虽然表面上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指揮，实际上他們各据防区，把持財政。他們对于軍校的筹建，不仅不予支持，反而进行阻挠破坏。因此，关于创办军校所需的人力、財力和物力，孙中山先生一筹莫展。例如军校开办时，孙中山先生批發了三百支粵造毛瑟槍，但却只交涉到三十支，勉强給衛兵守衛。黄埔建军計劃确定之后，苏联为了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一面派了数十名优秀軍事幹部到军校担任教育工作，一面又无条件地撥給军校二百萬元現款作为开办費。各种軍械也是苏联无代价地从海參崴分批运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調派了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許多优秀黨員担任政治教育工作並参加軍事工作。孙中山先生依靠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軍校的筹建工作才得以順利实现。

孙中山先生除亲自兼任军校总理外，关于校长的人选，最初决定为程潛，而以蔣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蔣介石当时無論在党在軍，都是后輩，孙中山先生派他为军校副校长，已經是“不次之迁”。但是蔣介石不願在程潛之下，对这个任命很不滿意，就离开广州，跑到上海，表示消極。这时张靜江、戴季陶等出来替他撑腰，张还亲自跑到广州找孙中山先生說情。孙中山先生这才改派蔣介石为粵軍总司令部參謀长兼黄埔军校校长。

孙中山先生还仿照苏联紅軍的政治委員制度，在军校实行党代表制度，並派廖仲愷为党代表。这个制度規定，军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須由党代表副署，交校长执行；未經党代表副署的命令完

全无效。有了这种制度，党的主义和政策的貫徹就得到了保證，就使軍校真正成为培养革命幹部的工具，而不致变为軍閥官僚的工具。后来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一起推行到国民革命軍各級部队中去，成为国民革命軍区别于过去一切旧军队的主要标志，同时也是北伐軍获得輝煌胜利的根本保證。

黃埔軍校于校长和党代表之下，分設政治、教練、教授三个部和軍需、管理、軍医三个处，另設政治总教官和軍事总教官各一人。政治总教官最初为戴季陶，后来戴离开广州，由副主任邵元冲代理。邵元冲是一个封建思想很浓厚的官僚，他把政治部当作一个官来做，既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幹部，同党代表廖仲愷也很少打交道，同苏联顧問也不来往。他这样搞了一两个月，就把政治部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毫无作用的官僚机构。因此，学校員生都一致提出撤換邵元冲的要求。这个問題經過廖仲愷、蔣介石和加伦將軍的会商后，决定請中共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来作政治部主任。于是，中共中央就决定調周恩来同志担任了这个工作。

軍校其他各主要部門負責人还有：教練部主任李濟深、副主任邓演达，教授部主任王柏齡。軍事总教官为何应欽，軍事教官有刘峙、张元祐、顧祝同、錢大鈞、陈繼承、胡树森、沈应时、陆福廷等。政治部秘書为聶荣臻、魯易。教育副官为季方、陈誠、徐坚。学生队总队长由邓演达兼任，副总队长严重；队长茅延楨、呂梦熊、金佛庄；区队长有蔣鼎文、严鳳仪、倪弼、惠东升、郅子举、郭俊、曹石泉等二十四人。軍事幹部多半是从李濟深的粵軍第一师抽調的，学生队的班长大部分也是从李濟深所办的西江講武堂調过来的。

應該指出的是，軍事教官都是出身于保定軍官学校等旧的軍

事学校或者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学校，有许多是从軍閥部队过来的。他們不仅带来了軍閥部队的腐敗作风，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对革命也是疏远的，甚至是敌視的；其中最突出的是王柏龄，他是蒋介石最亲信的右派头目之一，也是学生所最討厭的人。

苏联顧問方面除鮑罗廷和加伦將軍經常給以帮助外，派在軍校工作的有：顧問长（总顧問）契列班諾夫（当时同學們称呼他为“柴顧問”）、步兵顧問白礼別列夫、炮兵顧問嘉列里、工兵顧問瓦林、政治顧問喀拉觉夫等。

軍校招生工作除在广州能公开进行外，当时因全国各省都在軍閥势力控制之下，只能秘密就地考試或者动员青年学生来广州投考。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各地組織在这一工作上曾經起了很大的作用。应考的学生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北京、上海、武汉、长沙、济南等地区党委所遴选介紹的党团员以及革命青年学生和工人，在广州直接招收的学生不多。第一期新生由于选择的标准比較严，只录取了四百七十名，后来又收录了从远道赶来投考的四川籍学生二十余名，因此第一期学生共約五百名。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有大学生，有的仅具有中学程度，还有連小学也沒有上过的。但是从学生的政治条件来看，他們的家庭成分以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資产阶级佔絕大多数，剝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很少。据統計，第四期学生中，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佔百分之二十八，农民和城市小資产阶级佔百分之五十四，民族資产阶级佔百分之十八。黄埔学生所以能够在統一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中和北伐战争中表现出旺盛的战斗精神並且能够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深得群众的拥护和协助，除了軍校政治工作对他們的影响而外，他們本身的阶级成分也是一个根本因素。

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第一期新生入伍。六月十六日，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孫中山先生親臨主持。五百多個學生，一律穿著蘇聯式的黃卡其布軍服，整齊嚴肅，精神煥發，軍容極盛。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見過的新型軍隊，對於當時在場的各系軍閥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孫中山先生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革命所以遲遲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沒有真正革命武裝隊伍，沒有廣大人民的基础；現在無論那一個部隊，都是假革命之名，行割據之實，剋扣軍餉，剝削人民，貪圖私利，貽害蒼生，使我的革命主張不能實現。我做了驕兵悍將的傀儡，成為人民的罪人。過去如此，現在還是如此。為得完成我們的革命使命，所以我才下決心改組國民黨，建立黨軍，實行工农政策。第一步使革命的武力與民眾相結合，第二步使革命的武力成為人民的武力。這就是創辦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的主旨，也就是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的使命。”

二、黃埔軍校的教育內容和各期概況

黃埔軍校第一、二、三期的學程規定為一個月入伍教育、六個月正式教育；從第四期起，入伍教育期限延長為半年。教育內容是政治課程和軍事課程並重。一般學生的政治課程規定為：三民主義淺說、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國政治經濟狀況、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世界革命運動簡史等等。至於政治班，則除了上列各項課程之外，還有：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際政治經濟狀況、蘇聯概況、社會主義史、社會主義原理、政治經濟學、中國社會結構、中國農民運動、中國職工運動、中國青年運動、宣傳鼓動工作的意義和作用、軍隊政治工作等等。每門政治

課程最多的講十六次，每次兩小時；最少的講四次。教員按照各門課程的授課次數編寫講授提綱，在規定時間內講完。學生上課時當堂作筆記，既無書本，也沒有講義。

除了各門政治課程之外，還經常舉行講演會，集合全體學生聽講。講演的人除孫中山先生外，國民黨方面有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邵元沖等；共產黨方面有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等。周恩來同志和其他幾個共產黨員的講演很受同學們的歡迎，他們每次講演時，大花廳（即大講堂）里都擠得滿滿的，軍校的工作人員也都自動地去旁聽。國民黨右派分子邵元沖的講話最不受歡迎，人們把他叫作“催眠術教官”。

蔣介石為了使學生和官兵養成對他個人的偶像崇拜，經常集合學生、官兵進行所謂“精神講話”。他當時還兼任長洲要塞司令，並住在要塞司令部里，要塞砲台前面豎着一面大紅旗，旗上有一個斗大的“蔣”字。要塞司令部和軍校相距不到一里路，可是蔣介石每天上、下班，總是警衛森嚴。他披着一件拿破崙式的斗蓬，前面有一個副官開道，四個服裝整齊的武裝士兵跟在他後面，威風凜凜，好似戲台上大將出征的神氣。如果學生、官兵在路上遇見他，沒有向他敬禮，他一定要追究，給予處分。

在軍事教育方面，蘇聯顧問對黃埔軍校所付出的勞績是不可磨滅的。軍校創辦之初，為了適應當時革命形勢的需要，必須在短時間內儘快地訓練出一批軍事幹部。但是按照傳統軍事教育制度，培養一個初級軍官約需三年時間，而且軍校的軍官既是舊的軍事學校出身，他們的軍事教育知識都是舊的一套，要求他們打破常規，以革命的辦法來進行教育，也是很難辦到的。但是，在蘇聯顧問的幫助和指導下，這個問題勝利地得到了解決。

苏联顧問根据紅軍建軍的經驗，按照一个月入伍教育和六个月正式教育的期限，安排了各項軍事科目的进度和日程，並且定出詳細实施办法。此外，苏联顧問还提供紅軍最新的資料，重行編訂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和交通通信五大教程。在术科教育实施过程中，由于各級队长对于新的术科内容都是生手，都必須由苏联顧問講解示范。因此，每教一个新科目之前，都先将各級队长集合起来，由苏联顧問亲自教練，把他們教会之后，再讓他們回到各队去教学生。在野外演習时，苏联顧問常給学生作講評。那时学校还没有沙盘設備，他們就用树枝和石头摆在地上代替沙盘，对学生詳細說明怎样作是正确的，怎样作是錯誤的，給同學們的印象很深。

第一期学生，連同入伍教育在內，學習了七个月，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底畢業，畢業时仍为四个队，共四百九十三人。后来又把原定編入第二期第六队的軍政部講武堂一部分学生一百四十六人提升到第一期，因此，第一期人数增加到六百三十九人。講武堂学生有三百多人，当軍校第一期畢業时，他們有一部分学生要求併入黃埔，但全体官长反对，內部曾因此引起風波。当时由于急需下級軍官，而講武堂学生的学、术科成績又較好，所以这一百四十六人併入黃埔軍校后，特准提前畢業，並按照第一期畢業生的待遇分配工作。

第一期六百三十九人中，据李奇中同志估計，現已死去五百五十三人，只剩八十六人。

这一期畢業生除大部分派在本校教导团分別担任連党代表、排长、副排长、班长、文書、上士等职外，其余还有一部分派在校本部和政治部服务，一部分派在第三期学生队担任区队长，一

部分派到其他部队和军事机构（如海军、医院等）任政治工作，一部分派在各农民、工人团体（如海陆丰农民自卫军、广州工人纠察队等）担任军事训练工作，一部分派往全国各地进行革命活动，还有少数派在青年军人联合会工作。当时同学们为革命精神所鼓舞，不管什么工作都肯干，并不计较职位的高低，而且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发挥了很好的革命骨干作用。

一九二四年八月，军校继续招考第二期学生四百五十人，开始分科（第一期不分科），编成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四个队，于一九二五年九月毕业。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招考第三期学生一千二百二十四名，编为一个入伍生总队，升学后编为十个步兵队（其中一部分是后招收的）、一个骑兵队。从这一期起，学生入伍期改为半年，半年入伍期满，才转为军官学生。第三期学生于一九二六年一月毕业。

教导团成立后，军校由于调走了许多干部，乃于一九二五年成立了一个下级干部训练班，招收一批旧军官加以政治训练，作为补充。

一九二五年十月，招考第四期入伍生二千三百一十四名，编为第一、第二两个入伍生团，以后又成立了第三团（其中一部分后来编入第五期）。这时革命根据地已经统一，为了团结革命力量，统一军事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把原来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组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三月一日，第四期入伍生升学，编为步兵科第一、第二两团和工兵科、炮兵科、经理科、政治科等四个大队。十月，第四期学生毕业。前三期学生毕业后，分发工作范围只限于第一军。从第四期起，由于学校改制，毕业生就分发到

各軍担任軍職。因此，學校改制，對於在國民革命軍全軍範圍內推廣新的軍事教育制度和軍事組織，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一九二六年一月至三月，陸續招考第五期入伍生二千六百二十名。這時全國正處在革命高潮，各省青年投奔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日益增多。為了擴大入伍生的招考和訓練，學校成立了入伍生部，同時籌備招考第六期入伍生。這期間又成立了高等教育班，主要是訓練各級參謀人才（只辦了兩期）。第二次東征勝利後，在潮州成立了分校，抽調當時駐在東江的各部隊的行伍軍官加以訓練（共辦了兩期）。北伐軍克服南昌後，臨時成立了一個軍官訓練班，收容俘虜軍官千餘名施以訓練。

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公開叛變革命後，黃埔軍校的性質也就起了變化——它已由為革命服務的軍事學校變成了為反革命服務的軍事學校了。到了第七期畢業，黃埔軍校就被蔣介石宣布停辦了^①。據不完全統計，第六期共有學生四千八百九十九名（分為黃埔、南京兩個部分）；第七期共有三千二百七十三名，分在南京和武漢兩處畢業。黃埔軍校前後七期共培養了一萬五千四百餘名軍官人才。

中國共產黨在黃埔學生中的威信很高，凡是優秀學生，差不多都加入了共產黨。在各期學生中間，共產黨員和共青团員都起着核心和骨幹作用。例如第一期學生中就有八十多個共產黨員，第四期政治班四百六十人中就有九十九個共產黨員。第一期學生中的陳賡、蔣先雲，第四期學生中的林彪等共產黨員，在學生中

^① 據東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二十號時事日誌載，黃埔軍校於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七日“奉總司令令停辦，由第八路司令部派員接收”。

間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學生中的進步組織——“革命青年軍人聯合會”，就是由共產黨員蔣先雲、陳賡、王一飛、周逸群等負責領導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在文藝活動方面也很活躍。例如學生自己組織的“血花劇社”，曾經自編劇本，上演了一些以反帝、反封建為題材的話劇，得到群眾的好評。這個劇社的領導和骨幹，多半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

軍校各期學生的籍貫以湖南、廣東兩省為最多。前四期學生中，湘籍學生佔百分之二十四點七二，粵籍學生佔百分之十七點一〇；如以七期學生平均統計，則以粵籍學生居首位，為百分之二十六點六七，湘籍學生次之，為百分之二十五點五二；再次為浙江（百分之七點二〇）和江西（百分之六點二四）等省。

此外，還有一個事實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就是軍校學生中有一部分外國籍學生，如第四期有朝鮮籍學生二十四名，七期共有三十四名；還有一部分越南籍學生，七期共有十三名；並有少數蒙古、新加坡等外籍學生。這一事實表明，黃埔軍校在為亞洲其他殖民地國家培養革命幹部方面，也是有一定的貢獻的。

黃埔軍校除了培養出七期軍官人才之外，一九二四年底成立教導團，也是一件大事。當時教導團的新兵大部分是從浙江、江蘇、湖南等地招募來的青年工人和農民，工人中有不少絲織業工人，共編成兩個團。教導團的各級幹部都由第一期的教職員和畢業生擔任：何應欽任第一團團長，王柏齡任第二團團長，錢大鈞、劉峙、顧祝同、沈應時、蔣鼎文、劉堯宸分任營長；陳誠、郭俊、惠東升、鄧子舉、宋元竟等分任副營長和連長。第一期畢業生除少數擔任連長外，其餘分別擔任副連長、排長、副排長、特務長。第一團黨代表為繆斌，第二團黨代表為王登瀛，營級、

連級黨代表由第一期畢業生分別擔任。

教導團的編制採用三三制：每團三營，每營三連，每連三排，每排二十六名至三十名戰鬥兵。團部直屬部隊有兩個機關槍連、一個特務連以及偵探隊、通訊隊、衛生隊、輜重隊各一隊。作戰時一般都是以連為作戰單位，由軍官持駁壳槍任前驅，士兵持步槍跟着軍官前進。每連有軍官九人，其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共產黨員，他們在戰場上不僅身先士卒，還要監督其他官兵作戰。這一支以共產黨員為核心的部隊，在統一革命根據地的各次戰役中，成為革命軍的主要力量，能夠以少勝多，每攻必克，充分表現了革命軍隊的英勇頑強的特色。

教導團發展得很快，成立後幾個月之內便擴大成為兩個師（師長何應欽、王懋功）；到一九二五年十月間就編成了一個軍，即國民革命軍第一軍。

三、黃埔軍在戰鬥中鍛煉成長

國民黨改組後，鮮明地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革命綱領。因此，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和買辦勢力也就加緊勾結起來，陰謀推翻廣州革命政府。廣州的商團原是英國帝國主義直接支持下的大地主、大買辦的武裝，以香港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國民黨右派分子）與佛山大地主陳恭受為其首領。他們與英國香港政府和軍閥陳炯明勾結，利用商團名義，向香港德商訂購大批軍械，由一丹麥輪船運來廣州，陰謀暴動，妄想恢復大地主、大買辦資產階級的統治。孫中山先生接得密報後，立刻派黃埔學生乘軍艦前往沙角攔截，把這批軍械押回黃埔軍校。廣州商團兩次罷市要挾發還，並開槍射擊十月十日國慶節的遊行群

众。同时，駐广州的英国总領事也向广东的革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公然以武力干涉相威胁。于是，广州的局势突然严重起来。孙中山先生对商团的态度，开始还不够坚定，后来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才决心採取坚决的镇压政策。十月十四日派出黄埔軍校学生，开始軍事行动，其他各軍也随同动作，把商团包围在西关一带，经过一天的激战，就全部肃清。在平定商团的斗争中，广大的工农群众及其自衛武装，起了很大的作用。商团叛乱的削平，严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从而使广东的革命政府得到初步稳定。

黄埔学生在这次斗争中受到了第一次锻炼，提高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軍閥和买办资产阶级的革命情绪。黄埔学生战斗精神的旺盛、軍紀的严肃，給广州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埔軍校成立之初，广东的革命根据地本来是很不巩固的。那时广东的惠州、潮州、汕头一带，有軍閥陈炯明盘据着。他们在英帝国主义和北京反动政府援助下，准备打回广州，消灭革命政府。一九二五年二月，在中国共产党倡議和支持之下，广东革命軍队举行了第一次东征。这次东征的主力是黄埔軍校的学生。由于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員为骨幹的黄埔学生軍的英勇作战，和共产党员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的支援，到三月底就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佔領了潮汕。在这次战役中，以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棉湖之战最为激烈。革命軍以千余人抗拒号称万人的敵軍，苦战半日，终于在友軍的配合下，把敌人打垮。苏联顧問对全体官兵講話时，对这次战斗給以極高的评价。在这次战役中共产党员負伤的有連长郭俊、刘畴西等多人。

一九二五年六月初，楊希閔、劉震寰的滇桂軍與英帝國主義及雲南軍閥唐繼堯勾結，圖謀顛復廣州的革命政府。為了削平叛亂，東征軍兼程回師廣州，留守黃埔軍校的第三期入伍生也同時出動。六月十二日開始總攻擊，在廣州的工人及近郊的農民幫助之下（如鐵路工人罷工，使敵軍不能及時調動軍隊），僅半天的時間，便將楊、劉叛亂削平，革命政府乃轉危為安。

第一次東征勝利及平定楊、劉之後，在中國共產黨倡議之下，將廣東根據地原有的“大元帥府”的革命政權改組為“國民政府”。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並以黃埔軍校的学生為骨幹，將所有參加革命的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這時候，黃埔軍校的教導團已擴編成兩個師，後來又將許崇智的粵軍改編成為一個師，合併成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黃埔軍校校黨代表、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國民黨右派陰謀暗殺，全校師生悲憤萬分。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領導下，黃埔軍校的学生和部隊，與友軍配合並依靠省港罷工委員會和廣大人民的支持，解散和重新改編了廣東軍閥許崇智指揮下的粵軍，並把右派頭子胡漢民和許崇智驅逐出境。

一九二五年十月，廣東革命軍又舉行第二次東征，蔣介石任東征總指揮兼第一軍軍長，周恩來同志任總政治部主任兼第一軍的黨代表。十月九日，部隊逼近敵人重要據點惠州城。十月十三日開始攻城，戰鬥非常激烈，第四團團長劉堯宸及副營長共產黨員譚鹿鳴等都是在攻城時陣亡的。十月十四日傍晚，終於將号称東江天險的惠州城攻下。從此，長驅直入，二十一日佔河源，二十二日佔紫金、五華；二十七、二十八兩日大破敵軍萬余於河

婆。至此，陈炯明军队的主力消灭殆尽。最后追歼残敌于福建边境的永定，完全收复东江全境。在这一战役中，共产党员唐同德等多人牺牲。

和第一次东征一样，农民的支持对第二次东征的迅速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各地农民协会号召之下，男女老幼踊跃给东征军抬机关枪、挑弹药，还热情地把糖稀饭送到阵地上。行军时有些农民兄弟还端着喂马的饲料边走边喂。农民对革命军队的热情使同学们感动得流下泪来。

在历次战役中，黄埔学生都组织了宣传队，在战场附近的农村和城市进行宣传。共产党员傅维钰、李劳工等，当时都是负责领导宣传工作的。李劳工就是在敌后宣传中被反动派杀害的。

当时党所领导的各项运动，都有黄埔学生参加，如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纠查队，多半是黄埔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沙基惨案，黄埔学生死难的有文起代等多人。

四、两条道路的斗争

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发展，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和军队中威望的增高，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成长和壮大。这就不仅受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敌视，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仇恨。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黄埔军校的反动分子，也就日益露出了反革命的苗头。

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共产党为了改造在革命政府之下的各军军人的意识形态，发动学校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组成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在学生中有李之龙、蒋先云、周逸群、傅维钰、徐向前、

陈赓、王一飞、許繼慎、左权、陈啓科、黄鰲、李汉藩、楊其綱、袁策夷、刘云、张际春、余洒度等；教職員中有金佛庄、郭俊、唐同德、茅延楨、魯易、胡公冕等。这个組織的活动范围很广，不只限于黄埔軍校，也不限于陸軍；当时滇、桂、湘各軍所設的軍官学校，都直接或間接接受了它的影响。这个組織在平定楊、刘叛乱战役中，对于瓦解楊、刘的部队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这个組織却成了軍校中以蔣介石、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的眼中釘。在第一次东征时，賀衷寒、繆斌等反动分子就在戴季陶的影响下並在蔣介石的暗中支持下，組成了以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为宗旨的“孙文主义学会”，以与青年軍人联合会对立。这个反动組織的主要人物除了賀、繆二人以外，还有楊引之、冷欣、杜从戎、潘佑强、伍翔、曾扩情、鄧悌、賈伯涛、胡靖安、余程万、李杲、胡宗南、桂永清、蔣伏生等。教職員中王柏齡、林振雄、徐桴、王文翰、童錫坤、张叔同等，以及虎門要塞司令陈肇英、海軍將領陈策、欧阳格、公安局長吳鉄城等也都加入。与此同时，上海方面也由蕭叔宇、段錫朋和西山會議派童理璋、喻育之等發起組織孙文主义学会，与广州互相呼应。国民党在改組初期分化为三派，到了孙文主义学会成立的时候，大体上又合流了，他們相互之間虽然有矛盾，但是在支持孙文主义学会和反共活动方面差不多是一致的，仅仅在程度上略有差別而已。

青年軍人联合会在成立之初，为了照顧国共合作的精神，規定凡是黄埔軍校的同学，都是青年軍人联合会的当然會員。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后，参加这个組織的分子就有意識地退出了青年軍人联合会。这样，就很自然地把青年軍人联合会純潔化了，它就